

第一章

儒学的历史命运及其展望

一、儒学的兴衰与厄运

儒学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的主干，又扩展到东亚各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共同思想基础，其尊荣显贵远在诸子百家之上。儒学在发展史上也有兴衰荣替，但总的说来保持着兴旺发达的势头，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风气上处于主导的位置。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兴起以后，儒学不再独尊，却依然占据着主位，佛、道为之辅翼，即使在玄学流行的魏晋南北朝和佛学兴盛的隋唐，其基本格局也没有改变。当然，道家也是重要的学派，贯彻中国精神生活史的始终，它与儒学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但这种互补乃是阴阳互补，儒学代表着阳刚的方面，道家代表着阴柔的方面；从推动社会的实际发展而言，儒家的作用更大一些，道家的主要作用在于调节

和补偏。可以说，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在它的薰染下，儒学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社会的国民精神，尤其使知识分子得到了一种积极入世而又超越凡俗的思想信仰，内心有所归依。鉴于儒学在东亚的广泛影响，我们不妨说，儒学的精神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东方精神。

儒学真正遇到厄运是在近现代。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社会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巨变，儒学作为国学的政治依靠丧失了。不过孙中山只是要铲除帝制，建立民国，他并不全盘否定儒学，相反，赞赏“天下为公”的儒学思想，并主张发扬固有的传统道德，提倡仁智勇的精神。章太炎出佛入儒，热心整理国故，一身兼革命家与经学大师而二任。儒学在民国之初虽趋于衰落，但不悲惨。首次给予儒学以沉重打击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吴虞、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成为家喻户晓的响亮口号。中国第一流的先进知识界代表人物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出来猛烈抨击孔学和礼教，进步的知识青年无不受其影响而迅速加入批孔批儒的行列，于是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从此儒学真正失掉了它的主位性，声誉一落千丈，于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格局为之根本改观。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儒学的固有体系是中国古代宗法农业社会的理论形态，不能适应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需要，如要适应也必须作创造性的改造。但清代儒学早已失去理论再创新能力，学人的聪明才智主要用于古典考证。康有为托古改制，谭嗣同倡仁学反礼教，代表了革新派改良儒学用以更新社会的最后一次努力，结果没有成功。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国人丧失了“儒学救国”的信心，并从而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发生怀疑。儒学既无弘道的伟绩，又遭到社会保守力量的扭曲，变成专

制权力的工具和士人应付科举追求利禄的敲门砖，失去了活的灵魂。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恢复祭孔活动；军阀孙传芳、张宗昌则利用古礼及《十三经》来掩饰自己的丑行；一大批守旧人物抱着儒典和礼教抵制西方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压制青年个性解放和参与社会革新的正当要求，这就更加强化了儒学的消极形象，使它变得面目可憎。人们总是通过实际的生活体验来评价一种学说的，道理越好，实际越糟，人们就越反感。当中国近代处于被列强欺侮、贫困落后的东亚病夫、世界贫民的悲惨境地，而儒学不能救亡图存、保种强族，反被腐朽势力所把持，成为社会改革的阻力，也就难怪先进的中国人要以儒学为思想批判的主要目标了。可以说，儒学有着需要丢掉而且必然过时的部分，这些消极的方面引起激进派对整个儒学的憎恨。另一方面，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已经领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冲击着全世界，它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及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都达到了光辉灿烂的地步，远非农业社会所可比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和弊端又引发发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并在五四运动前夕在苏俄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此时的中国儒学，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处于相同文明阶段的佛教、道家和道教那样的挑战，而是比自己高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并在世界上取得主导优势的西方文明和随之而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先进的中国人在对传统文化表示失望的同时，为西方文明所震慑、所吸引，纷纷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出路，真是势所必然。在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双重夹击下，传统儒学第一次出现了生存危机。

“五四”代表人物在批判旧礼教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鲁

迅把历史上“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看作是“中国的脊梁”^①，其中包含了对儒学和佛教精英的赞扬。李大钊也曾说：“余之诘击孔子，非诘击孔子之本身，乃诘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②他将孔学与专制政治作了区分。但无须讳言，“五四”学者对传统文化尤其儒学的批判多有过激之言，相当简单武断，而且主要是选取政治的视角，缺乏学理的探讨。他们大都投身于社会改革洪流，来不及对儒学为主的数千年古代文化作出系统整理，因而也很难在透彻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分析评价。衡量儒学功过是非的主要是政治性标准，儒学几乎等于封建主义，它承担了专制政治的一切罪过。其结论是中国的落后和堕性在文化在儒学，不改变文化不消除儒学中国就不能新生。于是批判儒学就意味着革新进步，大家都不愿做封建顽固派，都愿意当新派人物，积极参加批孔，再没有多少具有现代眼光的知识分子能够沉下心来，从理解入手，深入到儒学内部作细致的研究工作。这样的学者也有少数，致力于文化的正面再造，但在动荡的时代，他们的声音很小，被汹涌澎湃的社会斗争声响所淹没。在强烈的反传统的社会政治气氛中，儒学被抛弃了，而且是简单地被抛弃了，所以它也就没有被真正克服（扬弃，即有保留的剔除）。把孔子从神位上撤下来是对的，因为孔子不是神，但把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描绘成罪人和小丑，使其光辉形象一度黯然失色，这未免太过分又太不明智了，可以说这是“五四”新文化文人犯的大错误，其消极后果极为深远，它使中华民族在很长一时

① 《鲁迅杂文选集》第 598 页，外文出版社 1976 年版。

② 《李大钊选集》第 80 页，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间内失去了文化上的象征人物，整个精神为之失落，外国文化不愿为客而为主。这样的蠢事，即骂倒自己民族古代文化伟人，别的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做过，只有中国人做了，而且主观还认为是振兴中华的需要，这是一场悲剧。五四运动的冲击从客观上说，也有清除糟粕以利儒学精华再生的功用，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五四”以后，西学在中国成为主流，但儒学的影响仍然存在。儒学的精神既然渗透到国民性格与心理和风俗的层次，它就不是单纯社会变革和思想批判所能消灭的，何况还有一批新儒家学者如熊十力、贺麟、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等人仍在著书立说，探索儒学的价值及其与西学和现代社会的结合，但他们的影响限于学术界内的小范围，与社会实际生活的关系是不大的。

1949 年以后，大陆废止祭孔，学校不再读经，经学再无传人，研究者亦寥不可寻，学界人士大都匆忙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希望跳出旧学窠臼，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评价古代文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在文化政策上本来早就确定了批判继承和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原则，但受到反传统的传统和越来越“左”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实际上以破为主，并不重视民族文化的继往开来。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运动连续不断，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学被作为封建主义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攻击，学者到曲阜孔庙向孔子脱帽鞠躬就被认为是严重的复古行为，儒学道德的继承问题是学术上一大禁区，儒学的厄运又一次加重了。在教科书里，除了荀子、王充、王廷相、王夫之等少数具有唯物论和无神论倾向的儒学者还能受到一些赞扬外，对儒学道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孟、董、程、朱、陆、王等人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一般青年学生不接触儒学典籍，起码的知识也没有。至于缺少文化的社会青年，就更不知儒学为何物了。

“文革”十年动乱中,反传统的思潮发展成狂热的社会运动,在横扫一切历史文化的声浪里,孔子和儒学再次受到猛烈冲击。批儒反孔运动延续数年之久,其声势、规模与广泛、激烈的程度,又远非五四运动所能相比。一个奇怪的理论诞生:法家是进步的,儒家是保守的,儒法斗争贯彻数千年,法家不断战胜儒学,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典型的影射史学,借历史的亡灵进行现实的政治斗争。但是为什么“文革”的路线是扬法批儒,这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评法批儒”运动吹捧秦始皇和法家,并不是要实行法制,主要是欣赏他们的君权至上和文化专制主义;它攻击儒学和孔子,主要是仇视他们的人道主义和中庸之道。要推行‘斗争哲学’,挑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就不能不批判“仁者爱人”、“和为贵”的思想。要推行‘打倒一切’的极端主义,就不能不攻击‘中庸之道’。”“文革”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与儒学是格格不入的,它是法家专制主义与“左”倾狂热病相结合的产物。“文革”表面上打着五四运动的旗帜,实际上丢掉了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好传统,却极度膨胀了它的简单化和政治化的批判作风,把文化虚无主义推向顶点,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社会出现了大破坏、大倒退,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降,文化领域满目疮痍,中国人为此已经付出并正在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

“四人帮”的垮台,使人们看到,批儒反孔的狂热鼓吹者同时也是封建遗毒的集中体现者,批儒并不总是与社会进步相联系,它还可以与社会倒退相联系,这就为人们摆脱‘五四’以来形成的‘反传统就是进步’的观念,和重新评价儒学,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二、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儒学新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生机蓬勃和开通的气象，文化上的封闭状态也同时被打破，外国的和古代的文化研究和争鸣一齐活跃起来，学者们可以自由地研究、评价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不再受政治运动的困扰。近些年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大大小小的文化学术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种传统文化和儒学的学术研讨会议，接连不断的召开。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有关的学术论著渐渐多了起来，在研究中形成一支可观的学者队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口号的正式确立，表示了社会上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这是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国情的新起点。

在 80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部分学者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口诛笔伐。批判者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们鉴于中国现代化屡遭挫折、步伐迟缓，企图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面，深入到民族传统文化里去寻找问题的根源，感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及其遗存，成了中国人前进的沉重包袱，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向保守型的文化，强调群体本位，压抑人的个性，培养奴性人格，窒息民族生命力，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思想障碍，必须用个人本位的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中国才有生路。《河殇》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这种批判触及了当前严重存在的封建遗毒，诸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以权代法等现象，自有其合理性。但这种批判仍然存在着“五四”以来那种简单否定、缺乏科学分析、把过失推给古人的毛

病。只要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不应该把社会生活中一切消极落后的东西统统归罪于传统文化和儒学，它们至少已被批判了半个世纪，难道还有什么孔家店存在吗？为什么孔家店被打倒了这么久，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路上步履维艰呢？情况不是比这个答案要复杂得多么？再说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有否资格动不动就对老祖宗乱加指责？假如儒学向来就提倡奴性，使人麻木，中国何以能在很长时间内繁荣昌盛，创造出世界第一流的灿烂文明？假如中国必须新生，不从焕发内部文化的生机入手，又从哪里起步呢？一个民族是不能彻底大换血的，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也要有内部承接消化的能力。传统有好有坏，儒学有优有劣。为了克服社会消极现象，正需要继承和发扬自强不息、人道主义、文明礼貌等优良传统。文化热中反传统思潮不像“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和“文革”中批孔反儒那样席卷中国大地，它只是近些年兴起的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股，不能左右知识界的大多数。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允许这样的思潮存在，同它进行学理上的平等的讨论，这对于深入发掘传统思想资源，正确理解和评价历史，有益而无害。许多人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们不再随波逐流，也不再剑拔弩张，中国人应该比以前更成熟了。

有相当一批学者认为：“儒学救国”固然迂腐，一味地批儒也不是出路，现在是既超越传统，又超越反传统，另辟新路的时候了。振兴中华首先要增强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并使这种精神和能力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源头活水，使之具有内在的雄厚的持续力，这就离不开对儒学的批判继承。神化孔子的时代早就过去，打倒孔子的时代也该早点结束，儒学不应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应该放在文化建设中加以思考。我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传统文化和

儒学有“三性”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时代性要转换,民族性要升华,人类性要阐扬^①。例如儒学的“三纲”说只适用于宗法等级社会,现在已过时;儒学重伦理的人生哲学,这是它的民族特点。儒学的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具有人类性的思想,西方称之为“金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对于儒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之。我又在《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针对有破无立的偏向,提出批判是手段,继承才是目的,要以发扬为主,努力发掘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为现代化服务^②。持类似态度与观点的大有人在,许多人都感到,必须从外部打倒传统进到从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中华文化的下一步发展应有这样的转向,才能走上健康的道路。

历史常会捉弄人,当落后的中国大陆仍以批儒为新潮的时候,在大陆周围的东亚“四小龙”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讨伐儒学,甚至保留着很多的儒学传统,然而经济却得到高速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也相当神速,令全世界注目,一时间谈论“儒学资本主义”,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当然,“四小龙”走的道路是否是“儒学资本主义”,远未得到普遍认可,但很多人承认,儒学至少不是现代化的障碍,它的优良成分有利于现代化事业。这一事实给予中国知识界以相当大的刺激,他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反观自己。大陆几十年不停地批判传统和儒学,良莠不分,玉石俱焚,断裂了文明发展的链条,非但没有为现代文明开出新路,反而把古代文明也丢掉了不少。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民族精英文化和世代积累起来的礼义道德备遭摧残,民族主体精神

① 《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

② 《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

在很大程度上失落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事业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大家都说，民族虚无主义要不得；‘文革’的错误不能再重复；‘四小龙’的经验需要借鉴，研究和评价儒学应当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

近些年欧美学者和西方华裔学者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活动，在中国大陆亦产生很大影响，他们能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用现代哲学和科学眼光，比较中西文化异同，发掘儒学深层内函和它的未来意义，对于儒学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这使得大陆一些本来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改变了态度，知道西方有识之士正在认真学习东方的智慧，探索后工业社会的道路，中国人反而自己看不起自己，这不是很可悲吗？港、台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及其朋友、弟子、学生，写了大量的儒学研究著作，在大陆广为流行，影响是很大的。大陆许多学者重视这一儒学新学派，认为它是使儒学现代化从而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寻找出路的新思潮，值得认真研究。儒学在四周邻区受到相当重视，而在它的发源地却遭受奚落和唾弃的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

90年代以来，大陆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拜金主义泛滥成灾，社会道德风气越来越坏，这不仅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的健康化，而且也直接损害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社会上下都感到要重建社会道德就必须充分使用传统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学的伦理思想。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即儒学从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应用和教育，通过普及性读物和教育系统，让青少年了解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从小养成文明礼貌的习惯，它的作用是多少篇专业的学术论文所不能替代的。这一儒学的普及运动正

方兴未艾，它的社会作用尚有待历史作出回答。

三、儒学的未来展望

当代中国大陆，正处在世界性文化冲突的交会热点。交织在这里的主要是三大文化系统：一是中国和东方固有的传统文化；二是从早期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三是来自现代欧美和日本的西方文明。这三大文化系统各有优劣。传统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备受打击，特别是古代文化要典的教学长期中断，社会上大部分人对于诸子百家和传统礼仪相当陌生。现在虽有好转，但也只处在“一阳来复”的阶段。“儒门淡泊”，佛、道与其余诸家何尝不是如此？但传统文化的积累丰富、根基深厚，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内容保存在民间风俗里，流淌在国人血液中，人们往往日用而不知，中国人的风格、中国人的气派、中国人的智慧还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恢复起来并不十分困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是需要加以改造和更新即可，它的生命力是无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流行了数十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学术理论等领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它创造性地容纳了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给自己开出一个新的境界。但大陆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十分曲折、相当艰难的过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苏联、东欧解体以后，它面临着内外的许多严峻挑战，如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还要走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在文化上，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自己“中国化”，也正在探索之中。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世界上有明显的优势，随着大陆的对外开放和

西方物质与精神产品的大量涌入，西方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已在大陆形成强大的冲击波，引起社会生活许多深刻的变化，尤其在青少年中西化的倾向是相当突出的，今后这种影响还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内外交流的加强而进一步扩大。但是西方文明已经走过它的颠峰期，开始暴露出它的许多根本性的缺陷并产生出若干深刻的危机，如人际紧张、生态危机、精神空虚、吸毒贩毒等等，人们已经开始对它作批评性的观察。同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中国，双方的文化传统有较大的差距，又各有优劣，所以使中国全盘西化始终不过是一种幻想。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只能在上述三种文化体系的互动中进行，相互碰撞，又相互渗透，既改变对方，又改变自己。大陆的思想文化不可逆转地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百家争鸣的新时期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途，我觉得它在历史上曾有过的主体性已不可能恢复，很难再有凌驾百家、万流归宗的新儒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陆将有新的儒学派和儒学思潮，而更多的不是儒学正式信徒的人，将以同情的态度对待儒学，研究儒学，有选择地吸取它的精华，把它融入新文化的内部，使之成为新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学在经过加工改造以后，将在多方面发挥作用，在人生哲学和道德重建上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不仅需要社会提供宽松的政治和文化气氛，而且需要学人对儒学有深刻而系统的研究，从而切实地把握儒学的精髓，并根据时代的需要去推陈出新，对社会生活有实际的推动，招来社会的赞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非常重要，任何好的思想理论都要有好的承担者才能有众多的信徒，儒学也不例外。因此，儒学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有必然性的预设，它将在主客观条件合和、必然性与偶然性互容、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中，为

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也许未来的儒学几经转换已经面目全非了，只要它的精华得到发扬，又何必去计较门户和名位呢？无论如何变化，孔子永远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理应受到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尊重，他的崇高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这个意义上，‘尊孔’没有什么不对，尊孔就是尊重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就是尊重教育和人才，就是向我们的民族文化认同。东亚各国也普遍尊孔，视孔子为东亚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它给东亚各国之间的交往带来文化上的亲近感，这是客观的情势，不是谁强加给人的，我们可以顺其自然，使用文化上的共同语言，促进国家之间的友谊。

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能否找到儒学与现代化恰当的结合点，关乎儒学的未来命运，所以即使问题复杂也要大胆进行探索，尽可能给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合理的说明。我想可否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儒学在重建中国的人生信仰方面发挥作用。民国以来，作为人生哲学轴心的儒学和作为宗教信仰轴心的尊天敬祖发生动摇，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新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空缺，不知何以安身立命，于是痛苦莫名，不得不四处探索，而主潮流是向西方寻找思想资源，新的民族主体信仰始终建设不起来，人生信仰呈散化的趋势。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大陆民众和知识分子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信仰核心，但后来“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种信仰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文革”之后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又出散化的趋势，既可以说是异彩纷呈，也可以说是杂而多端，到现在在人生哲学上尚未能诞生出一个人心归向的理论体系。当然，人生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多元的，不应也不能将一种学说定于一尊。但一个大的民族在精神归向上总应该有其主导的部分，或

称为主要精神支柱。我想在重建民族主体哲学的过程中，吸收儒学的丰厚积累是必不可少的。儒学的人生哲学就其精华而言，是积极的自强的，有高远的追求，又有切实的态度，重视个体的人格磨炼，又关切社会大众的命运，是一种相当健康而又合情合理的哲学。儒家极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提倡阳刚之气，鼓励人们树立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这对于造就一个活泼的人生和一个有生气的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儒家对人类自身有充分的信心，认为主体在实现人生价值中具有决定的意义，即人类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中国历史上的优秀知识分子，依靠对内心世界的开掘，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能够收拾住自家精神，不为物累，不为境移，从小我走向大公，获得极高的精神境界，使人生有了安顿处，并引发出高度的自我创造精神。儒家哲学把个人生存价值同国家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是经世致用的传统。当前中国正在振兴，知识界应当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增强参与意识，不做社会生活的旁观者，为建立更加合理的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上仅举其数端就可以说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必须从儒学中吸取大量营养。

第二，批判地继承儒家的伦理思想，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为现代化事业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目前的社会风尚可用得上两句古语，叫做“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中国早已不是礼义之邦，各种野蛮、冷酷、浮靡、斯诈、残人自肥、慢法犯罪行为比比皆是，拜金主义成为浩荡潮流，泛滥成灾，造成普遍的人性堕落和短期行为，使事业受损，人民受害，往往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秩序。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统统当

作封建道德一律打倒，形成道德传统的可怕断层，而这种断裂竟持续了数十年之久。50年代与60年代初的良好风尚主要是建立在政治热情之上，过分政治化，缺乏坚实的民俗基础，一旦政治生活发生动荡和混乱，如‘文革’，整个社会道德生活便随之而崩溃。加以打开国门，西方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的猛烈进入，更增加了大陆道德的危机。道德只能改良不能剧变，单靠政治手段推行也不能持久，只有靠渐进的移风易俗和教育才能逐步树立。而新道德的建立不能一味依凭苏联的加里宁，还必须借鉴我们自己的儒家伦理。愚忠愚孝愚贞我们不能要，但许多儒家传统道德也不能丢。如“五常”说就应该从“三纲”中分离出来，重新作出解释和评价。仁、义、礼、智、信五者都有可以继承的内容。推己及人的仁道，见义勇为的精神，礼貌辞让的习俗，明达事理的智慧，诚信不欺的品格，哪一样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呢？又如‘直’，即真诚待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一向是中国人交友、论人、举才的重要标准，应予提倡。对‘忠’与‘孝’也要作具体分析。忠君已经过时，而忠于祖国和人民、忠于职守的品德必须保存和发扬。片面尽孝固然陈腐，而敬爱父母和长辈却是东方美德，不能丢掉。在道德思想、道德规范、道德修养等许多方面，都必须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而加以创新和发展，舍此似乎无其他捷径可走。

第三，用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发掘和重新发现蕴含在儒家思想资料中的尚未被人充分觉察的智慧之光，使它放射出来，为现代文明增添异彩。仅举数例：被人们视为‘大道之原’的《周易》，就是一部变化多端、奥妙无穷的奇书，它包含着系统思想、序列思想、均衡原理、转化观念，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活力，每变换一个研究角度，就可以引发出一套新

的理论,而且层出不穷。西方学者已利用《周易》启迪出许多新学科,有的已应用到实际部门,从而显示出《周易》的世界性与未来性。再如儒家经学,几千年来形成一整套成熟而周密的训诂考证方法,若能用现代眼光加以整理和阐发,很可以从中推演出一种崭新的具有科学方法论意义的解释哲学,并对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儒学的辩证法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都有值得借鉴和用以充实现代文明的内容。这方面的前景广阔而美好,而能否做到推陈出新、化古成今,则依赖于当代学者的见识、功夫与能力。

第四,用现代管理学的观点,发掘、整理儒学的社会管理思想,赋予它新的生命,用于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直接推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有的学者指出,儒学管理思想以人为出发点,注意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稳定,善于利用心理因素和制约机制来调整社会出现的不平衡和无序状态,善于启发人的道德自觉,防重于治,对于上下左右关系都强调相互承担义务以利于达到相对的和谐,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些思想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的学者提出,儒学的重心在人,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培养、使用,恰与现代化管理所强调的‘管理的核心在人’的观念不谋而合,儒家在计划、组织、用人、领导、控制诸方面,均有合理的论述,可以用之于改善企业管理。在日本,企业家研读《论语》,运用孔子的思想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已不是个别现象,并收到实效。

儒学不仅仅属于中国人,它也属于东亚人,也属于全世界。由于它的积层特别深厚,蕴藏的珍品极多,它在对东亚文化保持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的同时,也渐渐对西方世界发生吸引的魅力。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为解决西方文明的危机而认真研究儒学

和孔子，评价有逐渐增高的趋势。以儒、佛、道为核心的东亚文化非但没有出现即将绝灭的征兆，反而由于不断显露出早熟性与现代价值而有重新崛起之势，随着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加强，它的文化传统也将更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可以预计，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将是东西方文化形成双向和多向交流与互补，为解决种种全球性危机而携手合作，共同促成世界文明新阶段的早日来临。从这样一个大的视角来看，儒学的未来命运将是光明的，而在这个儒学走向世界过程中，作为亚洲重心的中国，作为儒学故乡的中国，能否正确发扬儒学的精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国家，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中国人要好自为之。